

我和抗抗

文\杨以平

我是上海知青，抗抗是杭州知青，当年在北大荒下乡时，我们俩并不在同一个农场，但我们的相遇相知是偶然也是必然。

上世纪 60 年代末，大约是 1968 年吧，我因为父亲的“走资派”问题，成了“逍遥派”，整天无所事事。一天，父亲回到家，带来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孩，告诉我，这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女儿，大串联来到上海，希望我能和她成为朋友。我见她瘦瘦的，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扎着那时我们流行的两根麻花辫。她告诉我，她来自杭州，是 66 届初中，哦，比我小一届。

当知道她来自杭一中时，我马上兴奋起来，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，父母为我订阅了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期刊，经常看到有一个名叫“张抗抗”的杭州一中的少年朋友发表文章，由于名字特别，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我虽然喜欢看书，但写作文很烂，常得“3 分”（我中学时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行 5 分制），因此对这个“抗抗”有点崇拜。我很兴奋地问她，你认识她吗？她笑笑，说我就是抗抗呀。这下我惊讶了。因为有了好感，尽管那时刚接触，便马上像熟悉的老朋友了。

1969 年，我下乡去了黑龙江的长水河农场，抗抗来信告诉我她也来黑龙江了，在鹤立河农场。长水河与鹤立河分属黑河与合江地区，相隔很远，因此书信往来便成了我们联系的纽带。每天在繁重的农活干完之后，收取信件是我们最大的期盼和享受，除了家人来信，我最盼望的是能收到抗抗的信，她的来信往往很长，在信中向我倾诉苦闷和烦恼，也常常交流读书的感想。照现在的话来说，她是我的“闺密”，以至于她当时在农场的种种不顺，我都知道一些。我惊讶于她敢爱敢恨的叛逆个性，也佩服她的顽强毅力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农场很郁闷，感到前途渺茫，在那段时间，我和抗抗互相鼓励，写了很多信，遗憾的是，这些信件在我离开黑龙江时，全部付诸一炬。我们还曾引用了雪莱的诗句：当冬天来临之时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并互相鼓励：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！

我小时候学钢琴，喜欢音乐。她爱唱歌，也喜欢音乐。我下乡时把心爱的歌本带到了黑龙江，里面抄录了许多我喜爱的歌曲，如歌剧《白毛女》、《春雷》、《红珊瑚》，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、《五朵金花》、《刘三姐》等插曲。抗抗常写信来向我要歌谱和歌词。我抄好给她寄去，但这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那时这些旋律大部分是被批判的。

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大约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，我们相约在西子湖畔，抗抗租了两辆自行车，保俶塔、虎跑泉、玉泉、九溪十八涧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。在西湖边上，抗抗还请我吃了最有名的西湖醋鱼。在杭州，我俩全然忘记了农场里的种种艰难不快，被眼前的快乐笼罩，似乎真的在“天堂”。

我在农场时，参加了场里的文艺宣传队，当时有一位插队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天津知青张勇，为了抢救队里的羊群，被洪水卷走，献出了生命。为了宣传她的事迹，我们宣传队决定排练一个节目，此时我想到了抗抗，写信求援。她二话没说，就把长篇诗朗诵《张勇之歌》赶了出来，我们配上音乐，文艺汇演时，这个配乐诗朗诵还得到了农场的表扬。

大约 1975 年，抗抗写下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分界线》，那时我已回到上海，抗抗也被文艺出版社借调来沪修改这部小说。遗憾的是，她很忙，我也忙，所以见面机会不多，不过毫无疑问，我是这部小说的最早的读者之一。

现在抗抗已是著名作家，她送了我许多著作，可惜我并没有在写作上有多大的长进，但这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，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，也是被冠上“知青”标记的岁月。

蹉跎岁月

当年刚去崇明农场的都是年龄在十七八岁的知青，年轻气盛好逞强，身体结棍饭量大。第一年工资每月十八块洋钲，少得可怜，但对大多数刚从贫困家庭出来的学生来讲，却充满了无比兴奋，毕竟，这是开始独立养活自家的人生起点。

几个月下来，知青们发现，这十八块工资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要求：十块买饭菜票，余下买点皮皂草纸牙刷牙膏之类的生活必需品，孝敬爷娘的还要寄三五块钱回去；抽烟的男知青至少每月两条“飞马牌”五块六角，草纸么就用必须订阅的《红旗》杂志，每天撕一张绰绰有余。所以，临近月底，“脱底棺材”们就开始挖空心思。

一个“赌饭”的故事至今难忘。75 届男知青杨龙因身坯魁梧，干活猛，饭量大而扬名。一般男知青一顿吃半斤饭已够，而身高一米八的杨龙却要吃八两到一斤，甚至一斤二两。一角三分一盆红烧小肉，仅

“赌饭”的故事

有七八个麻将牌大小，如果敞开肚皮让他吃，五六盆没问题！

一天，知青们正在宿舍前或蹲或站狼吞虎咽般地边吃边聊。突然，73 届“小辫子”叫道：“啥人吃得下两斤白饭，我再送两斤饭票！”众人面面相觑，唯独杨龙面露怪笑，结巴着说：“真……真格？”“当然真格！”“小辫子”今朝就想叫杨龙难看，坦气地摸出一叠饭菜票丢在地上。在一片起哄声中，杨龙叫“小辫子”抽出两张一斤红色饭票，交到“中间人”胖子手里，指着“小辫子”：“依可勿……要赖！依现在就去买饭来！”

两斤饭买来了，两只大号搪瓷碗装得杳杳漭。杨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三下五除二地吞下了第一碗，第二碗也没打多少隔楞，但肚皮膨出不少。在一片哄叫声中，杨龙要去拿赢到的饭票。不料，“小辫子”再下赌注：“依再吃一斤，我加依两斤饭票，上哦？”杨龙能吃，众所周知，但一记头吃三斤白饭，却没人见过。此刻，

杨龙打着饱嗝，硬着头皮应战：“加三斤饭票我就上！依敢哦？”“哦……”在众人起哄中，“小辫子”正中下怀：“好！就加依三斤，吃坏肚皮不管我的事！”

杨龙和“小辫子”赌饭引来了不少捧着饭碗的围观者。第三斤饭买来了，此刻，杨龙的眼神有点慌乱，但还是摸了摸饱胀的肚皮，端起了搪瓷碗。吃到一半时，只见他饱嗝连连，咽饭时，头颈两边的青筋凸出，再也不像先前吃得那么轻松。一些人开始劝他停下，更多的人则狂叫着……

杨龙边翻白眼边艰难地咽下了碗里最后的二两饭后，肚皮胀得人也站不住，被人搀着慢慢地走，据说一直走到半夜，回到宿舍还彻夜叫“我……肚皮难过”；“小辫子”则以输了约可吃五天的饭票暗暗后悔。

发生在农场磨难岁月里的“赌饭”事件不少，看如今小青年吃饭没劲道的样子，真是感叹：今非昔比啊！

丁汀



人生驿站

崇明农场虽然地处上海北郊，但市区毕业生分配到那里务农，必须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

1968 年秋，我从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67 届初中毕业，分配到崇明东方红（原名百万沙，后更名长江）农场机械化大队三中队务农。当时，我刚过 16 岁，虽然年龄尚小，但也知道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，没有了市区常住户口，就没有了相应的粮油票证，要想在城市生存，就会变得异常艰难。特别是，当我听到去新疆农场的社会青年，谈起无奈失去上海常住户口后的亲身经历后，也意识到户口注销后想要恢复，是难上加难。只是不注销就不能报到，无法领取工资，还将成为被再次动员“上山下乡”的重点对象，最终分配到更远更艰苦的农村去。这样的结局我也不想尝试。

我一直煎熬到注销截止日前的最后一天，才从家里拿出户口本，独自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所属派出所办理手续。

“小同学，是来注销户口的吧？”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草绿色警服的中年男民警。他只是瞄了我一眼，就脸无表情地随口说出了这句话。

注销户口？民警同志，你为什么开口就问我这样令人伤心的话？难到我的命运注定是要被注销户口离开市区的吗？你难道就不能问问我，是不是来报户口的？

“小同学，你是到外地农村插队

注销户口

落户？还是到边疆农场干革命？”民警见我一声不吭，又连续发问。

实际上，市区 66、67 届高、初中毕业生分配到市区工矿企业的不需要动户口，到属地公安派出所来的，都是来办理迁移手续的。

“我是到崇明农场。”我轻声回答，并递上粉红色的毕业分配通知书。“喔，你是分配到崇明农场的？”“嗯。”我不愿意多说话。

“小同学，精神振作一点，不要垂头丧气的。能够分配到崇明农场，相当不错的了！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啊，路近啊！”民警连声安慰我道。“在你之前，我刚刚注销了两个学生户口，一个是到黑龙江农场的，一个是到江西插队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分配得不错？如果他们能够换到崇明农场，肯定会很高兴的！”民警一边继续自言自语起来，一边“巴哒”一下，盖下了一个小长方形的红条橡皮图章。

我从民警手里接过户口本，连忙打开内页，“户口注销”四个醒目的红色隶书字体，赫然出现在我的户籍栏上。我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从学校学生、市区居民，变为了郊区农场职工。我只能接受事实，转而求其次。我觉得民警劝慰我的话不无道理。前往崇明农场务农，在“面向农村、面向边疆、面向工矿、面向基层”的毕业分配“四个面向”里，的确是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”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嘴里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。

周海民

朝影夕晒

上海知青
史琦在黑龙江
生产建设兵团
三师 19 团屯垦
戍边苦练训练场
王邦/摄

返城之后

我与妻同属“老三届”。她“下乡”在安徽“插队落户”，房东夫妇视她如亲生女儿：一次她不幸患上脑膜炎，连日发烧昏迷不醒，他们日夜陪伴；我“上山”到黑龙江兴安岭某林场，林场老职工“大丛师傅”处处如父兄般照顾我。有年冬天伐木，他为了救我，差一点被倒下的大树压断脚骨。

返城之后，“第二故乡”的房东、师傅，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的“亲人”。婚后我与妻达成共识：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对待他们。

我们每隔一二月，写书信问候；他们生日时，邮寄一个包裹；重阳或春节，寄一些现金。我们也常常想“回乡探亲”看望老人，但是拖老带小较难成行，所以只去过安徽两次，而黑龙江一次也没回去过（这可能成为终生遗憾）！

就这样，一条“家规”遵循了 30 多年。“大丛师傅”于前几年病故，好在房东夫妇健在，而且家中安装了电话，如今要“问个好”更方便了。连我们的孩子也与乡下的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感情颇深。

最近，妻子多次提议在“家规”中加上一项：“每年抽时间探望一次老人家。因为他们的年岁已高，看一次少一次……”我想，这是应该的。

朱永平

难忘房东与师傅